##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018 年春季学期 举办十期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2018年春季学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成功联合举 办了十期(总第236-245期)宏观经济学研讨 会。至此,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已经走过了十一 个年头,累计举办245期。陈彦斌教授是宏观 经济学研讨会的创办人和主持人,经济学院 博士生刘哲希是本学期研讨会的联系人。

宏观经济学研讨会旨在通过追踪与研讨 国际宏观经济领域最高水平的前沿文献,为 与会者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定量宏观模型提 供借鉴思路,从而推动对中国宏观经济重大 问题的研究。每期研讨会由一位主讲人对一 篇理论文献进行精讲,并邀请一位优秀青年 学者进行深入点评。本学期宏观经济学研讨 会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薛涧 坡副教授,经济学院陈朴副教授(明尼苏达大 学经济学博士)、刘凯副教授(剑桥大学经济 学博士)、周璇助理教授(印第安纳大学经济 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小亮 博士以及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郭豫媚 等多位老师作为点评人。每期研讨会的主讲 文献和 PPT 均上传至网络(www.docin.com/ mydoc-88265459-1.html),以方便大家对相关 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微信公众平台(微信 号:大宏观)也会定期发布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的相关信息。

本学期研讨会主要聚焦于宏观政策有效 性方面的研究。刘哲希(总第 236 期)主讲的 文献 "On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Asset Bubbles"通过对 Gali(2014)的模型框架的进 一步完善与拓展发现 Gali(2014)提出的紧缩 货币政策会刺激资产泡沫扩张的结论是不成 立的。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发现,对无供给 弹性的泡沫资产来讲, 宏观政策无论如何干 预都无法改善社会总福利水平; 对于有供给 弹性的泡沫资产来讲, 宏观政策需要抑制新 增泡沫资产的规模,并要试图降低资产泡沫 破裂风险。郭豫媚(总第237期)主讲的文献 "Rethinking the Power of Forward Guidance: Lessons from Japan"从适应性预期的角度解 释了前瞻性指引难题,即为什么现实中前瞻



性指引的效果远不及理论研究中的效果。文 章认为,前瞻性指引难题与公众预期有关,现 实中公众预期具有适应性预期的特征, 而模 型中通常假定公众具有理性预期,这也可以 较好地解释为何日本的前瞻性指引效果比美 国更差。周璇(总第 238 期)主讲的文献"Rethi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 Evolution or Revolution?"回顾了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 来的稳定化政策。文章指出金融系统对于现 代化经济的稳健运行至关重要,未来需加强 稳定化政策的力度,且更加注重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和配合。王 兆瑞和周欣锐(总第 243 期)主讲的文献"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研究了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 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文章发现, 当经济不确定性 程度较高时,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会受 到一定抑制, 尤其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明 显。因此,文章认为,当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程度 提高时, 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积极并注重于其他

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随晓芹(总第244期)主 讲的文献 "The Effect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on Bank Lending Behavior"探讨了美国三轮量 化宽松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文章发现,第一 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对信贷增长有较强的 推动作用,第二轮操作却没有这样的效果。一个 主要的原因是第二轮量化宽松只是针对长期国 债而非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目标资产类型的不 同导致量化宽松政策对信贷的刺激效果出现了 差异。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 不能仅着眼于数量, 更应该核心关注目标资产

此外, 本学期研讨会还就金融因素对经 济周期的影响等宏观经济领域的前沿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刘凯(总第239期)主讲的 文献 "Dollar Funding and The Lending Behavior Of Global Banks"研究发现在欧洲债 务危机期间, 总部位于欧洲的全球银行大幅 削减了其美元计价贷款。文章通过理论模型 和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核心

机制有两条。一是,相比于这些银行在欧洲是 通过对风险不太敏感的储蓄存款进行融资, 在美国市场它们则主要通过对风险较为敏感 的共同市场基金进行融资。二是,外汇掉期市 场的摩擦使得这些银行难以充分地通过吸收 欧元储蓄来为美元借贷提供融资。文章从微 观机制上证明了全球银行在全球资本流动和 全球信贷市场联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为研究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溢出效应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韩少华(总第240期)主讲的文献 "Credit-Induced Boom and Bust"以美国对掠 夺性贷款的监管政策变化作为自然实验,检 验了信贷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文章结果 表明,信贷扩张可以在经济扩张期内显著刺 激房价上升和就业扩张,但也会使得经济衰 退期内房价下跌和就业衰退的幅度加大。陈 小亮(总第 241 期) 主讲的文献"New Evidence on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基于一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构建了一个新 的定量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进行了

定量刻画。进一步地, 文章使用所构建的指 标,对 1967-2012 年间 24 个 OECD 国家所发 生的金融危机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 现不同国家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存在明显差 异,而且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比我们预想 的要小得多。陈朴(总第242期)主讲的文献 "Diagnostic Expectation and Credit Cycle"研 究了诊断预期下人们产生的代表性偏差和信 贷市场的关系。文章发现,代表性偏差会导致 市场主体外推市场发展趋势或忽略市场风 险,这一特征能够解释信贷市场和宏观风险 的变化。黄源(总第 245 期) 主讲的文献"A Behavioral New Keynesian Model"改变了传 统新凯恩斯模型对于经济活动中参与人理性 预期的假设, 认为人们对于未来利率和产出 等变量的预测都是有限理性的。据此,文章通 过构建包含行为因素的新凯恩斯模型,解释 了现实中一些国家在面临利率零下限约束时 经济依然处于唯一均衡而非多重均衡的问

十一年来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影响力持 续扩大,每期研讨会都有来自人大本校、北京 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 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数十名师生参加。同时, 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培养了一批既熟知中国现 实问题又与国际前沿理论接轨的高水平创新 型研究人员,他们已前往剑桥大学、斯坦福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 学圣迭戈分校、波士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 印第安纳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攻读博士学 位,并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 究》以及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Applied Economics 等国际 SSCI 期刊上发表了 数十篇学术论文。多名优秀人才已在耶鲁大 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任 职。此外,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也向国家机关与 研究机构输送了大量视野开阔、理论扎实又 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场大讨论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的, 但是很多讨

论都偏离了实际问题,陷入了无谓的概念之

争。另外,还有些成果是重复性的,很多浅层

次的描述现象的作品也混杂在其中, 因而就

制造了很多学术泡沫。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非

常严重的,少数学者的创新性成果渐渐地被

学术泡沫给淹没了(劣币驱逐良币),在实践

也相当广泛, 但是真正做深入研究的是少数

人,尤其能够创新理论的就更是极少数,这是

科学研究的常态,创新性成果肯定是少数人

深入探讨的结果。应当看到,从事理论创新本

来就很艰难。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因为受

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影响,人们形成了因循守

旧的习惯,对于理论创新天然就具有抵触心

理,有些人甚至把陈旧观点当作标准来衡量

创新性观点。所以,在我们国家大家虽然都在

高喊理论创新,但是真正要实现理论创新却

都在高喊理论创新,但是对于创新性成果却总

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这还真有点叶公好龙的意

思,总说喜欢龙,但是一旦龙真的来了却都逃

之夭夭了。今天,大家天天都在高喊口号,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但是很多

学者客观上都僵化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

义与现实相冲突了,这样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的。还有些经济学家在无奈之下就试图用庸俗

理论说明现实。他们的理论虽然并不科学,但

却能说明表面现象,因而就受到了普遍的欢

迎,以至充斥了我们的主流媒体。他们为了使

自己的观点更具有权威性就把自己的成果名

之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是让马克思背了黑

锅。结果,不仅没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

用,反倒使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了。

我国学术界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大家天天

显然,这场大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影响

中也就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是极其艰难的。

▶▶▶[上接 **A2** 版]

## 对劳动、劳动价值论问题大讨论的评论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他们是在从事经 营管理活动,所以还是应当给些特殊考虑,为 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应当使他们的收 入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 在获取同等官员 的收入的基础上适当给予一些补贴。但是,这 种特殊考虑应当是有限的,即在他们从事经 济管理活动期间参照同类企业经营者的收入 水平给予一些经营管理补贴,这样也就足够 了。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在市场经济中打拼的 创业者和经营者,就没有必要采取限制性措 施了,对于他们的奉献和业绩市场是能够做 出相对准确的评价的, 他们的收入水平就应 当由市场来决定。总而言之,当国企还在垄断 经营的时候对经营者的薪酬就应当采取限制 性措施, 而对于处于充分竞争中的那些私企 经营者就应当完全放开了。当然,市场有可能 会使收入差距扩大化,以致有可能会使不同 行业之间,各类经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应当通过征收个人收入 累进所得税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当通过行 政性限制措施来解决。

现在看来,国企经营者的收入应当参照 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来决定, 也可适当给予一 些补贴,而私企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则不应采 取限制性措施,应当完全由市场决定。很显 然,政府的行政性限制措施并不具有普遍的 适用性,经济学家们不做具体分析,简单地为 限制性措施推波助澜实在是不智之举。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年的大 讨论实际上就是围绕最主要的几个经济范畴 而展开的,这里涉及到劳动商品这个特殊商 品范畴的问题,之后又涉及到工资的性质、资 本收入的性质、企业家收入的性质等问题,实 际上涉及的是工资、利润、利息等几个主经济 范畴的问题。可以说,经济范畴揭示了社会的 本质关系,是对社会本质关系的高度概括,它 们是系统反映一定社会整体面貌的基础,没 有这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创新和科学证明从整 体上反映社会的本质关系是不可能的。

(六)经济学家们还讨论了劳务的性质问 题,实际上它涉及的是生产劳动理论问题。

生产劳动理论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 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它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个讨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持续 了很长时间,对于这个讨论我们也应当做个 认真的总结。

斯密认为, 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生产 劳动,(同资本交换)为雇主提供利润的劳动 是生产劳动。(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304 页) 马克思则认为,一般来说,生产物质商品的劳 动是生产劳动,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角度就应当说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 生产劳动。(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05、556页)很显然,他们研究问题分别是 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出发的,是从不同社 会阶段的不同生产目的出发的,都揭示了生 产劳动的实质。同时,他们的生产劳动理论也 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斯密认为,国 王、官吏、军队、牧师等等的活动并不是生产 劳动,因而也就不创造价值,同时还认为花在 他们身上的费用是国家的"虚费",他们是社 会的"累赘"。很明显,他的这个主张是为反封 建的目的服务的。然而,资产阶级在控制了权 力之后就抛弃了他的观点,他们认为花在国 王、官吏等等身上的费用并不是"虚费",他们 也不是"累赘",这样的看法是符合这时的资 产阶级的需要的。但是,马克思则另有看法, 他认为国王、官吏等等不仅不是生产劳动者, 而且是"寄生者",是"多余的人"。毫无疑问, 他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表达看法的。显然,社 会主义社会与以往的社会根本不同,它是一 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上述结论不能运用于今 天的现实,对于今天的现实我们应当从实际 出发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我们认为,生产劳 动理论与生产目的理论相关。社会主义社会 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够满 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就都是生产 劳动,就都是创造(具有)价值的。

草英、攸全认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 劳动不能有其他标准, 而只能以是否创造物 质财富为标准。(《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9 期)孙冶方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 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关于生产劳 动和非生产劳动, 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 的讨论——兼论第三次产业这个资产阶级经 济学范畴以及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问题》, 《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于光远(《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 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何小锋(《劳务价 值论初探》,《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认为, 生产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 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杨坚白则认为,生产劳 动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同时又认为 服务业也是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劳动应是 新创造的价值超过消费的价值的劳动》,《经 济学动态》1981年第9期)显然,上述各位经 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是 有所不同的,学者们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而 把他们分成了"窄"、"宽"、"中"三派。学界普 遍认为,孙冶方是窄派的代表者,于光远是宽 派的代表者,杨坚白则自认为在窄派与宽派



之间,属于中派。何炼成、卫兴华两位教授也 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但他们又主张随着社会 的发展生产劳动的范围应当逐步扩大。比如, 何炼成认为,应当拓宽生产劳动的范围,他主 张第三产业的劳动也创造价值, 但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劳动除外。(《也谈劳动价值论一 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卫兴 华教授则认为,党政机关中具有创造性的劳 动也是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价 值论需要发展与创新》,《经济学家》2004年第 1期)很显然,孙冶方关于生产劳动认识的范 围是有一定限度的,何炼成、卫兴华的认识则 是在一步步地放宽, 而于光远差不多就彻底 放宽了。我们认为,于光远所代表的宽派观点 是符合今天的实际的。但是,仅仅认识到劳务 创造价值还不够,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证明 劳务本身具有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 个人劳务价值的计量问题。不过,证明劳务的 价值并不难,它与证明劳动具有价值的过程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主张某些产业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或者 某些部门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些都是在市 场经济还未充分发展(未形成统一市场)或者 还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阶段获得的认识,这 样的认识在今天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 比如,主张牧师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有什么 道理呢,如果没有了他们的劳动社会上宗教 信众的信仰需要如何得到满足? 把官员的劳 动分成生产的和非生产的两部分又有什么道 理呢,它除了会造成不同部门官员之间的相 互歧视之外会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实际上,牧 师的劳动能够满足宗教信众的精神需要,官

员的行政管理活动也为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所 必须。很显然, 主张牧师的劳动不是生产劳 动,某些官员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这样的规 定不过是一种主观规定而已。实际上,存在是 需要的结果,只要还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表 明它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现在看来,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再把劳动区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 产劳动已经没有意义了。

也许有人会说,只有强调物质生产劳动 的意义才有利于发展基础产业,才有利于发 展实体经济,而强调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意义 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这个问 题不应通过片面强调某些产业的理论来解 决,而应当通过遵循社会化生产的规律来解 决。任何理论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生产 劳动理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 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在阶级之间还处于 对立状态的时候, 片面强调某一产业劳动的 重要性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阶级对立 已经趋近消失的今天,在社会化生产已经相 当发达, 在各种生产要素能够通过市场在产 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时候, 再片面强调某一产 业的重要性就不合适宜了。这时候,为了实现 社会生产的均衡发展我们就应遵循社会化生 产的客观规律,就是使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 于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这样就能使国民经 济健康发展。

也许有人还会问, 如果说满足需要并创 造价值的就是生产劳动,那不等于说走私、贩 毒、卖淫、拐卖儿童等等行为都是生产劳动了 吗?不,它们不是生产劳动,而是犯罪活动,这 些问题应当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不应作 为经济学问题来研究。

## 三、对大讨论中的经验总结和趋 势展望

首先应当肯定,这场大讨论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性成果,是可喜可贺的。大讨论推动了 理论创新,但其中也有经验教训。现在,我们 对这场大讨论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很多讨论中,经济学家们都分成了不 同的派别。一是,有些经济学家为了急于说明 现实就采用了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 我称之 为庸俗派。二是,有些经济学家虽然坚持了传 统的价值论,但却没有解决问题,我称之为传 统派。三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创新性观 点,并能科学地说明现实,我称之为创新派。 现在看来,庸俗派使理论倒退了,传统派并未 解决现实问题,创新派推动了理论进步。但 是,遗憾的是这些创新性成果尚未被多数学

者所接受,更没有为主流媒体所接受。 同时,讨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通过大讨论毕竟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虽然还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认识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正 确的认识,也需要经过比较和检验才能逐步为 多数人所认识。我们坚信,真金不怕火炼,真理 会越辩越明,如果假以时日,并展开持续的讨 论,科学的认识就必然会在反复的比较中显示 出神奇的力量, 就必将会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就必将会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应当指出,这场大讨论是面对新时代的 新问题而展开的,因而就代表了学术进步的 方向,因而就具有了世界性意义,所以我们在 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就会积累普遍的经 验,就有可能会提供中国智慧,对于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